

宋真宗时期的神异流言

——以天书事件和帽妖流言为中心的考察

方 燕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成都 610066)

摘要:北宋真宗时期各种神异流言甚嚣尘上,社会风云更加激荡。祥符年间的天书事件是神道设教的需要和产物,是一出自上而下荒诞不经的闹剧;而天禧年间的帽妖流言则是一起自下而上危及统治的重大事件。统治者炮制天书及流言,止息帽妖流言,表面上看似明显不同,实际上都是从其既有立场和利益出发,维护和巩固其既有统治的一体两面。

关键词:神异流言;宋真宗;天书事件;帽妖流言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6-0159-06

神异流言^①是指关于鬼神精怪、神人异事、天文或社会异象的流言。这类流言通常是以人物或虚拟的灵异事件为核心,借助夸张、渲染或润饰的手法制造神异故事,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北宋时期统治者炮制祥瑞异,渲染灵迹,为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大造舆论声势,而怀有不同动机者也通过神异流言以达成其政治或经济目的,如揭竿而起者通过神异集结力量,僧道巫覡以神意虚张声势、为害一方,奸民黠贼假神佛之名行敛财之实等。真宗时期,貌似升平安宁的景象之下暗流涌动,各种神异流言甚嚣尘上,社会风云更加激荡。本文拟以天书事件和帽妖流言为切入点进行考察。

一 天书事件及流言始末

真宗景德、祥符年间,“天书荐降,祥瑞沓臻”^{[1]138},大宋王朝似乎出现前所未有的升平景象。所谓“天书荐降”,实则人为设计,前后共有五次。第一次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乙丑,有天书降于宫城左承天门南角;第二次是同年四月辛卯朔,天书降于大内功德阁;第三次是六月乙未,天书降于泰山醴泉之北;第四

次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十二日,被奉为“天尊”的赵氏始祖赵玄朗降授天书于延恩殿;第五次是天禧二年(1019)三月,永兴军巡检使朱能诈称天书降于乾祐(今山西柞水)山中,赴京进献,真宗至琼林苑亲迎天书入宫供奉。

真宗时期的天书事件,实际上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由君臣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流言闹剧。《宋史·王旦传》详述真宗时期天书、祥瑞频现而封禅始行的起因:“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

收稿日期:2017-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研究”(11XZS008)之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方燕(1969—),女,四川岳池人,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史、文化史及社会生活史研究。

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旦龟勉而从。帝犹犹豫,莫与筹之者第。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2]9544}从中不难看出,真宗君臣炮制天书、大行封禅的动机有四。一是摆脱城下之盟的窘境。二是夸耀威服四海。其中缘由,如王钦若所言:“今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敬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3]120}三是粉饰太平。天书事件实为真宗“修太平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宗方议东封西祀,修太平事业”^{[3]145}。其中,所谓“太平”实为皇帝矜夸、佞臣谄媚的粉饰之辞。祥瑞、封禅由此大行其道。据朱弁《曲洧旧闻》卷一载:“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楼观灯,见都人熙熙,举酒属宰执曰:‘祖宗创业艰难,朕今获睹太平,与卿等同庆。’宰执称贺,皆饮醕,独李文靖沆终觞不怿。明日,牛行王相问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劝欢甚,公不肯少有将顺,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常恐谀佞之臣,以之借口干进,今人主自用此夸耀臣下,则忠鯁何由以进。既谓太平,则求祥瑞而封禅之说进,若必为之,则耗帑藏而轻民力,万而有一,患生意表,则何以支梧。沆老矣,兹事必不亲见,参政他日当之矣。’其后,四方奏祥瑞无虚日,东封西祀,讲求典礼,纷然不可遏。”^{[4]387}四是神道设教,凝聚人心,巩固统治。《宋史·真宗本纪》云:“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觊之志坎?”^{[2]172}

封禅自古为旷世大典。《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曰:“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5]1355}封禅仪式的象征意义在于“增高”、“广厚”^{[6]141-142},沟通天人,烘托君权的威严和神圣。欲行封禅,天瑞实为不可或缺之物。王钦若说:“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2]9544}天瑞即上天所降祥瑞,为封禅的必要条件。

真宗君臣为达到封禅目的,想方设法排除障碍,大兴祥瑞,为封禅鸣锣开道。世所谓祥瑞者,“麟凤、龟龙、驺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灵芝、连理之木、合颖之禾皆是也”^{[7]108},通常意义上的祥瑞主要是“奇兽、异

禽、草木之类”^{[8]3517}。真宗君臣在此之外更别开生面地伪造天书,使之成为“天瑞”最为重要的标志性象征。在真宗东封西祀、祭谒老子的过程中,天书作为最引人瞩目的瑞物,在前开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辛卯,真宗起驾离京,以玉辂载天书,作为前导,在仪卫扈从之下,浩浩荡荡地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台,陈天书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帝袞冕奠献,庆云绕坛,月有黄光,命群臣享五方帝诸神于山下封祀坛,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黄气纷郁。壬子,禅社首,如封祀仪。紫气下覆,黄光如星绕天书匣”;“十一月戊午,幸曲阜县,诣文宣王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丁丑,帝至,自泰山奉天书还宫”^{[2]138-139}。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二十三,同样奉天书先行,在仪仗护卫下,从汴京出发,前往宝鼎县(今山西万荣西南)奉祇宫,祭祀汾阴后土。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十五日,再次奉天书,率百官离京,至亳州太清宫,祭谒老子。此外,围绕天书的降临,建道场,设宫观,制法物;作新乐,绘新图,撰赞语;改年号,立圣节,等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使大中祥符年间的施政染上浓重的天命色彩。

伪造天书的过程,其实就是统治者制造、散布流言的过程。其中,前四次均由真宗君臣自编自导自演完成。第一次是真宗大造声势,煞有介事地假传神人意旨将有天书降临。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上召宰臣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对于崇政殿之西序,上曰:‘朕寝殿中帘幕,皆青絁为之,旦暮间,非张烛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夜将半,朕方就寝,忽一室明朗,惊视之次,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黄箬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对,忽已不见。遽命笔志之。自十二月朔,即蔬食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结彩坛九级。又雕木为舆,饰以金宝,恭仁神祝。虽越月,未敢罢去。适睹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朕潜令中使往视之,回奏云:‘其帛长二丈许,絁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朕细思之,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书被迎至道场后,“授知枢密院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启絁,命尧叟读之。其书黄字三幅,辞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藏于金匮”^{[8]1518-1519}。天书从神意下降、忽现、拜受到宣告天下的运行过程,无不伴随离奇的流言。首先,真宗向重臣昭告神人将降天

书意旨,绘声绘色地描述神人降临的场景,从具体时间、地点到对话无不细微,即或寝殿明暗、神人服饰也作了铺陈;然后,详述天书降临、发现的过程,天书的包裹方式和特点;最后,是拜受天书、宣告内容,以彰显大宋政权的正统性和真宗统治的永久性。奉迎天书藏于金匱后,围绕这一盛事举行了各种庆贺活动,如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京城祠庙、各地宫观,在崇政殿大宴百官,下诏大赦改元,群臣加恩,许京城畅饮三日等。此后,又授意儒士以经义附和,吏民竞言祥瑞、表请封禅。第二次天书下降,史载较略。第三次与前两次有所不同的是,天书下降的地点在真宗授意下被搬到泰山。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丙子,“上复梦向者神人,言来月上旬复当赐天书于泰山,即密谕王钦若。于是钦若奏:‘六月甲午,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见黄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识,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见其上有御名,驰告钦若,钦若等就取得之。遂建道场,明日,跪授中使捧诣阙。’奏至,上亟召王旦等谕其事,欲自出奉迎,即命旦为导卫使。”己亥,天书被迎至含芳园的正殿,“陈尧叟跪读,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赐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8]1549-1550}在群臣歌功颂德声中,再掀起新一轮竞献祥瑞的热潮,诸如芝草、金丹、嘉禾、瑞木之类应有尽有,社会舆论被最大程度地挑动起来。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十二日,真宗再一次谎称梦见神人传旨将有天尊圣祖和天书降临:“先是,上梦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皇及天尊之命云:‘先令汝祖某授汝天书。’翌日夜,复梦天尊言:‘吾座西,当斜设六位。’即于延恩殿设道场。是日五鼓,天尊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后唐时,七月一日复降,主赵氏之族。’谓上曰:‘善抚育苍生,无忘前志。’寻上圣祖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乃诏避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应天庆观并增圣祖殿;以七月一日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寻又上圣祖母号,曰元天大圣后。”^{[9]157}真宗借机大造声势,上尊号,定圣节,建景灵宫和太极观以供圣祖、圣祖母。

前四次天书事件发生在封禅之前,是为封禅大行鼓吹之实,以做好舆论上的准备,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所造天书的内容公之于众,昭告天下。天书第一次降于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宰臣王旦等人拜贺,建议:“启封之际,宜屏左右”,而真宗坚持当众宣读天书内容,理由是“天若谪示阙政,固宜与卿等祇畏改悔;若诚告朕躬,朕亦当侧身自修,岂宜隐之而使众不知也”^{[8]1519}。二是继天书下降,祥瑞频现。三是借天书

降临之机,臣民奏请封禅。如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书降;三月甲戌,兖州父老 1200 人诣阙请封禅;丁卯,兖州并诸路进士等 840 人诣阙请封禅;壬午,文武官、将校、蛮夷、耆寿、僧道 24370 余人“诣阙请封禅,不允”,“自是表凡五上。夏四月甲午,诏以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庙、岳渎诸祠”^{[2]136},丙午作“昭应宫”以敬奉安放天书,曹济州、广济军耆老 2200 人“诣阙请临幸”^{[2]136}。而最后一次即天禧三年(1019)三月的天书事件则发生在封禅之后,是永兴军都巡检朱能与宦官周怀政勾结伪造天书,并诈称现于乾祐山中,通过劝说寇准出面将其上报朝廷以增强其可信度,从而坐实流言。后因权力斗争,流言的主角周怀政、朱能或被杀或自杀,经丁谓和皇后的揭发,永兴天书的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此次天书虽可看作大中祥符年间天书的余绪,但与前四次天书事件相较,无论是伪造动机还是结果等方面均相去甚远。

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乾兴元年(1022),天书事件及流言前后持续长达 14 年之久。仁宗登基,王曾、吕夷简等人“以为天书本为先帝而降,不当留在人间”^{[10]2689},“惧貽后世讥议,故请藏天书于梓宫以灭迹”^{[11]54},仁宗于是下令将天书殉葬于真宗永定陵。至此,天书事件落下帷幕,流言方告烟消云散。

真宗时期的天书事件及流言,可以说是君臣共谋、玩弄的一套自欺欺人的把戏。正如孙奭所言:“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12]264}大中祥符天书之事“起于佞臣”^{[11]479},由王钦若首倡、丁谓等人力主,即便是寇准、王旦等股肱重臣也未能置身事外,“寇准能赞亲征,而不能不傅会天书,王旦能致太平,而不能谏东封西祀”^{[13]158},“当时力攻其非者”^{[14]239},仅孙奭、张咏、戚纶等几人而已。群臣“造作天书符瑞,以为固宠容悦之计”^{[11]54},伪造天书、上奏祥瑞、歌功颂德者得以加官进爵、恩赐厚赏,“祥符、景德间,四方争奏瑞物被赏”^{[15]180}。真宗热衷于祥瑞之事,臣民便投其所好,“争奏符瑞,献赞颂”^{[9]149},不惜“以诬下罔上为己任”,“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幸之资”^{[11]505}。周密《癸辛杂识》所记“金龟称瑞”的故事,就辛辣地讽刺了以丁谓为代表的朝臣捏造祥瑞的事实。故事云:“真宗东封回,至兖州回銮驿覃庆桥酺,赐辅臣、亲王、百官宴于延寿寺。有金龟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荚。丁谓以献,上命中使赍示群臣。余为儿童时,侍先大夫为建宁漕属官,廊后多草莽,其间多有此物,有甲能飞,其色如金,绝类小龟,小儿多取以为戏,初非难得之物也。鹤相善佞而欺君,乃遽指以为祥瑞,载之史册,真可发后世一笑也。”^{[16]73}

真宗君臣导演的天书事件,是神道设教的需要和产物。“宋真宗借天意来强调其皇位正统性”,“从宗教法理上解除了他人觊觎皇位的可能”^{[17]572}。因为皇帝本身特殊的身份,在天书的虚与实、信与疑之间更增加了其复杂性和神秘性。《儒林公议》卷上云:“祥符中,军士有告其营将诽谤天书者,上怒,欲鞫正其罪。时马知节在枢府,力言不可,且曰:‘天书之降,臣等若非亲承德音,亦未之敢信。矧军校乎,苟正其罪,则军政不能肃矣。’遂止。”^{[18]11}

如果说真宗时期的天书事件及流言是一出自上而下荒诞不经的闹剧,那么天禧年间的帽妖流言则是一起自下而上危及统治的重大事件。

二 帽妖流言的始末

真宗天禧年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帽妖事件,由于“事件的一些特性——能动的伤害性、强度、不可预测性以及不可控制性”^{[19]282},使其引起极大的社会恐慌。据《宋史·五行志》载:“天禧二年五月,西京讹言有物如乌帽,夜飞入人家,又变为犬狼状。人民多恐骇,每夕重闭深处,至持兵器驱逐者。六月乙巳,传及京师,云能食人。里巷聚族环坐,叫噪达曙,军营中尤甚。”^{[2]1449}对于洛阳上空忽现的状如乌帽的不明物体,时人无法做出判定和解释,便附会妖妄的色彩,将其径称为“帽妖”。很快地,关于这一神秘外来物夜间飞行,出没人家,幻化为犬狼作祟的流言便不脛而走,民众深陷困惑和恐慌之中。为防范于未然,每到夜幕降临,家家户户紧闭门扉,并严阵以待,手执兵器,伺机驱逐。帽妖流言从洛阳始传,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迅速蔓延至京师,并波及到应天府等地,“时自京师以南,皆重闭深处”^{[8]2118},“远近相恐,未昏则捷户灭烛,匿童稚,以黄纸熏柱置门,用为厌胜”^{[20]16}。

帽妖亦称席帽精,是一种状如席帽的精怪。“席帽,本古之围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韦之,四周垂丝网之,施以珠翠”^{[21]553}。宋初沿袭唐风,“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则以席帽自随”^{[22]15}。

帽妖流言起自洛阳,盛传于汴京,与两京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洛阳历来有“古都多怪”^{[23]45}之说,而京师汴京为首善之区,也是各种信息高度汇集、频传之地,所谓“都下喜妄传事”^{[24]1488},正反映流言、小道消息在京城的风传。加之真宗统治晚期热衷于天书、祥瑞、封禅之事,借以文饰其政,奸佞之人、逢迎之辈便投其所好,邀宠求荣。于是,“京师妖妄繁炽,遂有席帽精事”^{[3]120}。

帽妖流言的传播、扩散引起社会大恐慌,这种“面

对现实的或想象的威胁做出的不合作和不合理的心理与行为反应”^{[25]425-426},如不能及时加以阻遏,就会演变为严重冲击社会秩序的事件。帽妖流言在洛阳初传时并未受到有效控制,大致处于放任状态。天禧二年五月丙戌,“河阳三城节度使张旻言:‘近闻西京讹言,有物如帽盖,夜飞入人家,又变为大狼状,微能伤人。民颇惊恐,每夕皆重闭深处,以至持兵器捕逐。’诏使体量,又命侍御史吕言驰往,按本府长吏洎转运、提点刑狱司不即上闻之故。仍设祭醮禳祷。”^{[8]2117}朝廷虽派人前往,但只是停留于对地方官不能及时上报的追责,“祭醮禳祷”也未能起到任何实际的作用。每当灾异降临、流言乍起之际,吁请神灵、祭祀祈禳也成为人们应对突发事件、希图消灾免难的手段。祭祀祈禳源于古人对超自然力的敬畏和笃信,对神秘现象的困惑与无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纾解心理上的不安、紧张与恐惧,但却无法将人们从所面临的危险境地真正解脱出来。诚如张咏所言:“妖讹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乎厌胜也。”^{[2]9801}因此,帽妖流言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高峰,转而向京城迅速流播。“西京河阳妖怪大起,不经旬日,已到京师。或云变化多般,或云形状怪异,递相惊恐,街坊不宁”^{[26]1058}。帽妖作为一种客观但更多是想象的存在,带来巨大的现实威胁。从流言初起时的“微能伤人”,到盛传时的“云能食人”,被放大、引申为更为惊悚的故事,“使没有思想准备的大众陷入迷惘、危机和惊恐状态。再加上相互之间的感染和刺激使这种恐惧情绪急速上升,直至成为群体性的恐慌大发作”^{[25]426},京城“里巷聚族环坐,叫噪达曙,军营中尤甚”^{[2]1449},人们惶惑之余不能自己,“克服这种恐惧的办法就是加强紧密性,缩短距离”^{[27]程序-1},因此纠合宗族力量,通宵达旦地喧闹不停,以壮声势。由于“聚集的人群会对同一刺激性的言论、举动、画面迅速产生一种怂动心理,进而广泛感染,形成连锁式反应”^{[28]73},使向来整肃的军营也未能幸免,竟至成为流言的重灾区,直接威胁到统治秩序,从而引起朝廷的高度关注。

迫于形势危急,真宗于是年七月下令采取一系列应对举措。其一,鼓励检举揭发,彻查造谣传谣者。“上虑因缘为奸,诏立赏格,募人告为妖者。既而得僧天赏、术士耿概、张岗等。令起居舍人吕夷简、入内押班周怀政鞫之,坐尝为邪法,并弃市,其连坐配流者数人。然讹言实无其状”^{[8]2118}。在追查信源和兴风作浪者的过程中,不免累及无辜,有扩大化的倾向,朝廷“遂出榜文,定其爵赏,许人告首,庶获妖人。自后捉到夜

聚晓散人张子元数百人,命吕夷简制勘,决杀头首六人,其余免死。惊扰捕逐,数月方安”^{[26]1058}。针对这种现象,右正言刘焯言:“近者诏捕妖人,许陈告酬赏。亦虑所告之人,妄觊重赏,诬执平民。按问之际,愿令详审。”上曰:“比令纠告造妖者,及吕夷简推劾,屡戒其审察,无使枉滥,果多不实。”随即“诏今日已前犯者,更不问罪”^{[8]2120}。朝廷采纳刘焯之议,诏令不再深究其罪,使动荡的局势得以稳定下来。其二,表明态度,问责地方。“徙知陈州冯拯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代王嗣宗。以嗣宗知陕州。时帽妖兴自西京,嗣宗不得察故也”^{[8]2119}。其三,严禁京城居民传播流言、制造恐慌。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六记载:帽妖流言传至京师,“闾里惊扰,严刑禁之乃止”^{[3]120}。而地方对帽妖流言的控制也取得显著成效。知应天府王曾面对危局,“令夜开里门,敢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兴”^{[8]2118},“戒徼巡之,吏悉令屏去,有为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于境,民情遂安,妖讹乃止”^{[20]16}。一方面严惩造谣者,另一方面下令大开城门,“在混沌不明和充满危险的环境中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29]135},使妖怪夜间食人的说法不攻自破。

三 真宗时期防控神异流言的实质及成效

真宗时期炮制天书及流言,止息帽妖流言,表面上看似明显不同,实际上都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和利益出发,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体两面。伪造天书,争言祥瑞,鼓动舆论,东封西祀,为的是洗刷奇耻,粉饰太平;而对帽妖流言前后处置方式的差异,同样反映了其维护统治的深刻用心。流言初传时,之所以采取体察问责、祭祀祈禳的方式,只是将其作为地方性的一般事件进行处理,但在流言传至京师,导致人人自危、军心动摇,可能破坏稳定、危及统治的情况下,朝廷就不得不密切关注,并进行严厉镇压。

实际上,早在真宗统治初期,对于变乱易发之地的流言治理就颇为关注,如咸平四年十二月丁未“诏西川

诸州长吏严察细民,敢有讹言动众,情理切害者,斩讫以闻”^{[8]1089};而对京师妖妄之事更是高度警觉和着意防范,如大中祥符五年三月癸未颁布“禁妖妄人诏”:^{“访闻闾阖门内,有人众目为先生,每夕身有光明,能于隙窍出入无碍,是必妖妄惑众,其令开封府速擒捕禁止之”}^{[30]735}。在大体平息帽妖流言之后,真宗天禧年间曾多次下诏严禁妖妄。如天禧二年七月壬申,“以星文示变,赦天下流以下罪,死罪减一等。十恶致死,故杀、劫杀、谋杀人、官典枉法赃至死,造妖惑众者,论如律”^{[8]2119}。天禧三年四月戊辰,颁“禁金商等州祭邪神诏”:^{“隆平之政,实贵于防邪。聪直之神,不歆于非类。是以前圣立教,明王守邦,具有宪章,绝其淫祀。朕纂承基绪,抚育苍黔,伸孝飨于宗祫,本禋燔于天地,一则以归功报本,一则以祈福兆祥,所冀寰区,毕登仁寿,而小民寡识,鄙俗易讹,如闻金、商等州,颇有邪神之祭,或缘妖妄,辄害生灵,达予予闻,良用矜軫。宜令所在,严禁绝之。如复造作休祥,假托祭祀惑众,所犯头首及豪强者并处死,余次讫黥面配远恶处牢城。”}^{[30]736}天禧四年四月丙寅诏:^{“自今天下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放火、强劫贼、官典正枉法赃、伪造符印、魇魅咒诅、造妖言、传妖术、合造毒药、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罪至死者,每至十二月权住区断,遇天庆节即决之;余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断遣,禁锢奏裁。”}^{[8]2193}真宗频频下诏惩治妖邪,足以反映这类流言流传面之广、破坏性之强、影响力之深,给当时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困扰和压力,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严惩重处。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收到实效,但流言却难以就此得到根绝。究其原因,一是流言滋生的社会土壤的存在;二是止息流言者出于利益的考量,往往摇身成为流言炮制者,甚至陷入迷狂的境地,尤其是天书封祀,“一国君臣如病狂然”^{[2]172},又不得不说是对流言所带来的实际政治好处趋之若鹜。

注释:

①关于宋代神异流言的专门性探讨,目前仅见刘大明《宋代妖术谣言的社会传播现象与帝国治理机制》(《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史稿》,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文。

②原书标点有误,笔者引用时标点有改动。

参考文献:

- [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司马光.涑水记闻[M].邓广铭,张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 [4]朱弁.曲洧旧闻[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班固.白虎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7]周密.齐东野语[M].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9]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M].许沛藻,顾吉辰,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0]魏泰.东轩笔录[M].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1]洪迈.容斋随笔[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2]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G]//丛书集成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 [13]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G]//宋集珍本丛刊:第8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 [14]吕中.大事记讲义[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5]刘摯.忠肃集[G]//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6]周密.癸辛杂识[M].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7]王瑞来.“平世之良相”:王旦论——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二[C]//台湾大学历史系.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2000.
- [18]佚名.儒林公议[G]//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9][美]A·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M].林颖,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20]谢应芳.辨惑编[G]//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1]马编.中华古今注[G]//说郛(宛委山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2]吴处厚.青箱杂记[M].李裕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3]蔡條.铁围山丛谈[M].冯惠民,沈锡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4]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5]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26]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27][德]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M].冯文光,刘敏,张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28]侯东阳.舆论传播学教程[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 [29][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30]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The Supernatural Rumor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zong in the Song Dynasty

FANG Yan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zong in the Song Dynasty, various supernatural rumors spread wildly so that social contradictions sharpened. The sealed book event during the Xiangfu period, schemed by the ruling class, was a ridiculous farce in order to instruct the public in sacred way. On the contrary, the hat-like monster rumor, rose from the folk society, was a significant event which posed great threat to the governor's grip. The governor's actions seem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se two events. However, both served for the vested interest group, they were the two sides of the same purpose so as to consolidate the governor's domination.

Key words: supernatural rumors; Emperor Zhenzong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sealed book event; the hat-like monster rumor

[责任编辑:凌兴珍]